



毛泽东曾为新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诗词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对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以其蔚为壮观的中国气派令无数人为之陶醉。

醇厚独特的民族风格

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毛泽东指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毛泽东要求中国的文学艺术要符合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情感、趣味和习惯。

毛泽东诗词古朴典雅、对仗工整、抑扬顿挫，是运用旧体诗词形式反映现实斗争和现代生活的光辉典范。正如毛泽东对作家梅白所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句，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可以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毛泽东诗词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的深厚土壤，蕴涵着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元素，从文化名人到历史典故，从民间故事到神话传说，从哲学思维到日常习俗，字里行间，俯拾皆是。毛泽东诗词中反复使用的意象，比如日月江河、风雪云雾、苍松腊梅、旌旗鼓角、炮声弹洞等，要么是历代文人骚客借以托物言志的传统物象，要么是现代作家用来描绘战争风云的常用素材。它们既是诗人审美创造的工具，也是读者寄寓情感意念的载体，有着广泛的认同性、易理解性和易交流性，具有不同于别国民族文化的独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气派

□ 汪建新

毛泽东诗词是20世纪最优秀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对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蔚为壮观的中国气派令无数人为之陶醉。

特魅力。在中国诗坛上，很少有人能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体现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民族特色，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

通俗易懂的鲜活语言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是最具中国气派的创作原则和价值导向。毛泽东始终致力于使中国古典诗词大众化。毛泽东诗词深入浅出、明白晓畅、雅俗共赏。

毛泽东一向反对使用古奥偏典，故作艰深晦涩。他借用的典故都是广大人民群众颇为熟悉的，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牛郎神女、吴刚嫦娥。毛泽东引用或化用的名人诗句，如“一枕黄粱再现”“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唱雄鸡天下白”等，即使不注明出处、不进行解释，也不会产生歧义。

毛泽东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活语言，新鲜质朴、生动活泼。“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是行军路线、道路状况的真实描绘。“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是对敌我双方态势的分析判断。“当年鏖战急，弹洞千村壁”是战争遗址今昔对比的客观纪实。这种语言，经得起行家里手嚼嚙玩味，普通读者也一看就懂。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取自谚语“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来自湖南民谣“上有黠巖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而“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等，则是日常口语直接入诗。《八连颂》通过“全军民，要自立”和八个“不怕”总结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堪称是用群众语言写就的经典文献。

“两结合”的创作原则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毛泽东倡导的文艺创作原则。前者强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再现，后者主张既表明对现实的态度又体现对未来的渴求。毛泽东诗词是“两结合”的光辉典范，既弘扬了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毛泽东诗词蕴含着充满激情的理性，炽热而深邃，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毛泽东诗词史诗般地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使读者能够全面客观地体察中国人民的疾苦与心声，剖析中国革命的形势与任务，重温20世纪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与沧桑

巨变，追溯毛泽东跌宕起伏的奋斗足迹和心路历程。毛泽东诗词又洋溢着充满理性的激情，深沉而浓郁，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诗词想象独特、语言奔放、亦真亦幻、意味深长，在平淡中彰显神奇，在黑暗中出现光明，在困难中看到前途，在曲折中展现刚毅。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读来使人荡气回肠，能够感染人、鼓舞人、激励人、塑造人。

毛泽东把充满激情的理性和充满理性的激情融合得出神入化，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浑然天成。每首作品都既是现实的又是浪漫的，只是不同作品各有侧重而已。以《七律·长征》为例，它是现实主义力作，也是浪漫主义精品。就纪实长征这一重大事件而言，它是现实主义的；从抒发红军不畏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而言，它是浪漫主义的。每一首诗都概括了长征的某种特征，都再现了长征史诗的局部面貌，都赞扬了红军的钢铁意志和豪迈情感。真实的感受、磅礴的力量、澎湃的激情使《七律·长征》成为千古绝唱。

韵味无穷的审美意境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中写道：“诗要形象思维，不能

如散文那样直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毛泽东反复强调“诗要形象思维”，要借助形象表情达意，力求情浓缩而含蓄，景生动而传神，言有尽而意无穷。正因为如此，他在《沁园春·雪》的自注中写道：“‘雪’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界”也就是意境，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美学范畴。毛泽东诗词情景交融、意境高远。《沁园春·长沙》上阕把江南秋景写得宏伟壮阔、绚丽多彩，与下阕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相匹配。“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毛泽东化静为动，赋予雪山雪原以生命活力和人格意志，雄浑气概跃然纸上。“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毛泽东移情入境，使意与境融为一体。

毛泽东在意境创造方面，既源于古人又高于古人。《采桑子·重阳》是咏秋之作。毛泽东一扫“自古逢

秋悲寂寥”的悲秋情结，称颂战地黄花的馥郁芳香，讴歌革命战争的壮美崇高，赞美秋日风光的苍劲寥廓。毛泽东诗词魅力无限，不仅因为毛泽东功底深厚，更在于精神崇高，诚如清代沈德潜《说诗碎语》所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吐纳风云的豪放气势

毛泽东说过：“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向豪放，不废婉约。”豪放派气势磅礴、意境雄浑，婉约派婉转含蓄、缠绵悱恻。除《虞美人·枕上》纯粹属于婉约，毛泽东诗词明显偏重于豪放格调，包涵寰宇、贯通古今，凸现出大国气象和伟人气度。

毛泽东的豪放笔法，恰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他描绘的事物总是境界阔大、宏伟壮观，而他笔下的时间纵贯古今、时空交错。《沁园春·雪》大笔写意，寥寥数语，就把幅员辽阔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几个人物，就把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娓娓道来。

毛泽东胸襟博大，志存高远，将个人情感和人民悲欢相融合，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相联系。毛泽东诗词中有指点江山的激扬，有秋收暴动的霹雳，有众志成城炮声，有万里长征的凯歌，有残阳如血的壮烈，有横扫千军的畅快，有天翻地覆的慷慨。毛泽东诗词所反映的生活内容跌宕起伏，所展现的精神世界浩瀚豁达，所抒发的主观情感热烈奔放，所承载的思想内涵博大精深，令人震撼、给人鼓舞。

文艺评论

《李保国》的启示



《李保国》中央党校演出剧照

□ 施真强

11月13日晚，由河北梆子剧院创排的原创现代戏《李保国》在中央党校礼堂倾情上演，我作为进修部学员完整地观看了这场精彩的演出。《李保国》以河北梆子特有的艺术形式歌颂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剧中有一个片段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特别受启发。

有一次，跟随李保国夫妇一起在太行山岗底村扶贫种苹果的5个硕士研究生，在写毕业论文时遇到了思想困惑：自己的选题都是指导农民如何运用新的技术栽培苹果方面的，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对农民很有用处，但却难以找到刊物发表，因为一般刊物都认为这些课题不上档次，没有层次。正当学生们为此苦恼时，李保国教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说了一句话：我们要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写在祖国大地上！一下子让学生们豁然开朗。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多么豪迈、多么生动、多么深刻的一句话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就是

要投身太行山农村扶贫、科技惠农的实践中，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出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将技术转化为丰产高产优质的农产品，让知识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山区老区群众的脱贫致富。

这真是一篇充满豪情的、了不起的论文。李保国是怎样写这篇论文的论？第一，在农民的期盼中选题。当岗底村遭受严重山洪灾害，群众生活无着、发展无路时，李保国指导他们在片麻岩山上种植绿色有机优质苹果，让农民群众找到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可靠路子。第二，在向农民的调查

中开题。李保国长年在太行山区农村开展农业科技推广扶贫，在向农民调查中掌握了农村的气候、土壤、光照、水源等情况，因而知道苹果怎么种、新技术怎么用，并且很快就见了效。第三，在与农民的共同劳动中做题。李保国在太行山的贫困村子里安营扎寨，与农村干部群众一块儿劳动、一块儿生活，亲力亲为做技术实验、试验示范，将手中的技术、脑中的知识无私传授给农民，将理论在实

践中运用，实现了技术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第四，在改造农民的思想观念中答题。李保国在农业科技扶贫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阻力，有思想认识不到位的阻力，有对新技术不理解的阻力，有技术操作不熟练的阻力，还有科研成果评价标准不科学的阻力，等等。李保国都在千辛万苦、千言万语中一一作答，一一克服，才成就了一篇篇精美的文章。

据统计，李保国教授用了35年，走进太行山，推广运用28项科研成果、36项实用技术，让140万亩荒山披绿，让10万多农民脱贫。那大山里一片片硕果累累的苹果园，一个个颇具实力的苹果加工经营公司，一幢幢新建的农民新房，就是他在太行山贫困农村写就的一篇篇论文。

这些论文质量档次价值如何？能打多少分？当然该让农民群众来评判。农民们评判的方式很特别，也很真诚感人：在听说李保国教授要离开岗底村回学校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干部群众都来了。大家捧着自家果园中丰收的大苹果，自家种植的南瓜、花生、小米、红薯等山货特产，拉着他、拦着他，要挽留他，要他收下。很多人说起自己家和岗底村9年来种苹果脱贫致富的经历，都热泪满面，都对李教授感激不尽、充满深情。这种感人至深的场面，不就是对这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论文的最高评分吗？

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论文，其打动人的，就在于它的选题、开题、做题、答题都是以贫困农民的需要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这就是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论文的真谛。

李保国把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更写在了人民群众的心底里。

学员作品



随想录

常识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知识

□ 梁鸿鹰

今夏北京流传过一个故事。说是随着一位百岁文化老人的仙逝，他那人去室空的旧居被远在海外的儿女们售卖。该旧居位于北京市中心，持币争购者甚众。那些曾与老人朝夕相处的藏书捐给家乡大半之后仍所余甚多且颇具价值，此次将与房子一同出售。就为这些藏书，老人子女决意找到合适的购房者。他们希望购房者出身文化家庭，有教科文卫相关职业背景，还要真正爱书，为此对购房者进行了严格的“面试”。当然，最终结果如何，现在已然没人考证。毕竟，这些都是传说。

这位仙逝的老人便是周有光先生。老人学富五车，百岁后依然笔耕不辍。读了他这本篇幅、开本都不起眼的《常识》，感慨不少。2015年9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华盛顿州联合欢迎宴会上演讲时提到的一本书也叫《常识》，是1776年美国入托马斯·潘恩署名为“一个英国人”发表的，只区区50页。可见，但凡有勇气以常识为话题的人，向来都不简单。周老先生自称“这一生是认真思考过这个世界的”。他厚积薄发，观察得多，感悟得多，他自称一辈子致力于给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写文章，追求明白晓畅，《常识》就有一种拉家常的自谦和从容。

常识具备不言自明的真理性，由于是一些通则、通例、通识，倒最容易因习焉不察而被忽略，最需要被重新提出来。真相被埋葬、掩盖、略掉，会导致判断失误。提醒人们注意常识，意味着要对大多数人心目中似是而非的定见进行重塑，解疑释惑、拨乱反正，让人们在困惑时有所依傍。英国作家哥尔斯密曾说，“我们只能从书本上学到极少有关世界的知识。”况且书本有时更容易成为错误知识的集散地，更容易导致偏见、定见和模糊之见。“有书为证”最易形成“从来如此”，让人不再加以审视。鲁迅向来是质疑一切，他有句著名的话“从来如此便是对的吗？”而周有光先生强化的是那些正确的、合格的常识，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人们被“从来如此”的老教条所蒙蔽与框限，让影响人们判断力的潜在“依据”及时退出历史舞台，把一些难于逾越的思考障碍物清理掉，的确很有意义。

周有光说的“常识”主要涉及文化、语言、传统、教育以及现代化、全球化等话题。这些常识的提炼或经历过漫长的过程，或付出了一定代价。常识有时候需要经过反复检验。比如，汉语采用拉丁字母，特别是搞拼音方案，当初有许多人不理解，偏激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会因此而流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汉语和拉丁字母如今“彼此依偎，相互扶持”，每个中国人今天都不能不和字母打交道。“在国际互联网时代，这几个微不足道的拼音字母，可能发挥帮助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的作用”。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结论。

跟着时代发展大势思考，才能让“常识”常新。《常识》中的文章周先生大多写于百岁前后，但绝无陈腐之气、隔代之感，说明老人没有死读书、读死书。他始终目光如炬地盯着飞速发展的时代，边注视着国际大势，边思考着现代化的未来。他主张，现代文化以科技为中心，由全世界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创造。中国不仅要利用全人类公有财富，而且要从国际文化的客人，变为国际文化的主人，走进其殿堂，参与其创造，丰富其内涵。他认为，传统与现代比肩行走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特征，“双文化”“双语言”是国际文化的突出现象。如韩国青年出于农耕集体主义思维希望父母负担学费，同时又出于资本个人主义思维而不愿意承担抚养之责，企业家信守资本主义文化而拼命扩大资本，却出于农耕集体主义观念把财富和经营权交给子孙，说明在现代化社会中，旧文化依然没有来得及退出历史舞台。“双语言”同样反映了传统与现代同时并行的现状。二战后新兴国家大都面临建设国家共同语、使用国际共同语等问题，西方、东方、东南亚均无例外。在我国，普通话是学校和社会语言、方言是家庭和乡土语言，这是“国内双语言”，从普通话到又说英语，达到“国际双语言”，这些现象的分析会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周先生揭示的“常识”发人深省，大多是因为社会规律得到了揭示，让每个读到的人都感同身受，增长见识，避免愚钝和蒙昧，有益于开创新生活。